

The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of PBL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empowered by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deology

Lei Cai

Hunan Changsha Electric Pow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31,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 idea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PBL learning paradig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is, the mor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empering in matters” were explored, presenting the three leaps of the Confucian view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resonating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e “questioning benevolence” style of “problem is matter” laid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and the problem chain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acquire knowledge” constituted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he “essence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has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from “problems as time” to “problems as circumstanc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ivate practice-based cognition through authentic scenarios and echo the intrinsic principle of “attaining the good conscience”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virtue. The methods and paradigms presented are all formed under the three-dimensional closed loop composed of the ontology of problem symbiosis, the methodolog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nested, and the value theory of virtue and skill cultivation. The two collide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ultimately present themselves.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from “The Great Learning”, but also follows the method of “learning by do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us providing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solu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Keywords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PB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知行合一” 思想赋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PBL 教学的范式重构

蔡磊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131

摘要

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有助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PBL学范式的重塑。以此为基底挖掘“事上磨练”所含蕴的义理，呈现了儒家知行观的三个跃迁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学理共振，“问仁”式的“问题即事”奠定了本体论基石，“格物致知”的问题链构成了方法论支架，“知行本体”实现了由“问题即工夫”向“问题即境遇”突破；高职思政课借真实性情境激活基于实践的认知，以德性生成性的评价呼应“致良知”的内在准则，所呈现出的方式与范式皆是在问题共生的本体论、知行嵌套的方法论、德技兼修的价值论构成的三维闭环下形成，二者互相碰撞和融合最终以呈现，既传承了《大学》“学行统一”之道，也遵循了职业教育“做中学”之法，从而为中国高职思政课提供了一种中国哲学方案。

关键词

知行合一；高职；思政课；PBL；教学

1 引言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教学传统中，“知行关系”的哲学探寻是始终贯穿其中的。孔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是一种知行实践的自觉；朱熹：“知行常相须”（《朱子语类》），这是对知行关系进行的一种辨析；王阳明“知行合一”（《传习录》），实现了“事上磨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PBL 教学模式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D58）。

【作者简介】蔡磊（1983-），女，中国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练”的工夫论的本体论转变，“把知之真理会贯澈到了行之而上”，使“知”的确定安顿于“行”之中，成为职业教育“做中学”的本土哲学基因。当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称思政课的教学中较易出现忽视学生所处职业背景的情境性这一特殊性，致使所产生的知识无法达到可以转变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的程度。“事功之能”。王阳明“知行本体”论有“问题即工夫”的本体论观照，PBL也有“以问题为中心”的建构主义观照，二者之间存在先验同构。另外，“若好好色”的具身认知（《传习录》上），可作为高职思政课的教學情境设计的价值基础；“致良知”的自律规范是“德技并修”评价的依循准则。知行兼重、见之于行的儒家知行观在从孔子的“学行统一”、到朱熹的“知先行后”、再到王阳明“合一共生”的演变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内涵意蕴。儒家知行观范式三次跃迁式发展，实际上就是“问题本体论—情境具身性—评价生成性”三维互证。这种横跨千年的对话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对职业教育类型的哲学回答，“在事上磨”才能“知职业之理”“行良知之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要将这种“天下之大业，莫非求道”的中国哲学古训“推致其中”，形成中国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

2 儒家知行观的三次跃迁：

与PBL的千年对话从春秋杏坛到数字课堂，儒家知行观经历过三次范式跃迁，均以“问题”为枢纽节点，在历史与现实与中国本土和世界文化中当代的PBL理念产生了交集并形成了共鸣。孔子以“先之劳之”（《子路》）创“以事为问”之新风，“知政”实为“有司失职”、“贤才举用”的现实疑问。《论语》的“问仁”“问孝”，本是运用具体的现实问题指引“事上体认”的学业钻研，“射不主皮”式的求道求学，在问难答对的“中靶”之中达致于学成德备。郭店楚简所载“习者，习其性也”（《性自命出》）论述，证实了知识欲达到习熟通达的境界必须经过其它问题解决的过程，这奠定了儒学奉行“即问即行”意识的基本实践本源。朱熹构建“格物致知”的“问题链”体系，“今日格一物”的渐修工夫，将“天理”拆解为草木、人伦等具体问题，形成递进式认知网络。《朱子语类》“知行常相须”的辩证，以“饮食知饥饱”为例，阐明问题解决中知与行的互动关系，为PBL的“问题支架”提供古典参照，使儒家知行观首次获得系统化理论形态。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提出“知是行之始”（《传习录》），将“事”升华为“问题”本体。“除草需根上用力的”隐喻，揭示“事上磨练”即问题解决的本质。南赣剿匪的“十家牌法”，通过解决“盗匪隐匿”问题，实现“破贼”与“破心”的统一，形成“问题即工夫”的本体论突破，与PBL“问题是学习起点”深度契合。古今对话聚焦三重共鸣：真实性是指“儒家”事“PBL”真实问题”都注重情境化，“具身性”是指“体知”的传统和“做中学”都不主张悬空的知识，“生成性”是“成人”目标和“全人培养”

合二为一于问题解决的过程之中。由《论语》中的“不愤不启”再到PBL“驱动性问题”，教育的方式已不同，但不变的是“问题即道场”的实践哲学，“不愤不启”的千年“定理”，彰显了中华文明“即问即行”的大智慧正在当下的实践中重解新时代的“实践即真知”。

3 范式契合：

王阳明“知行本体”论与PBL的深层耦合基于对“问题”是知行共生载体的本体论认同，《传习录》“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命题，在知识与实践二分的基础上解构出“问题”，“问题”既是认识的发生源也是行为的完成体；王阳明释“格物”为“正事”（《大学问》），其用“格物”指称主体“解决问题”的行动要素，PBL“以问题为中心”的建构主义逻辑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异质同构性，知识并不是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思政课中通过介入问题而自生的意义之网。从方法论层面上讲，PBL是问题驱动复现王阳明“事上磨练”的工夫论，《传习录》里“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说明了这一点。从认知科学角度来讲，PBL正是“做中学”，引导高职生通过“行”获取认知，并在实际行动中发现、学会某些知识；而所谓的“知行合一”也正是在行为的过程中了解真理，“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就价值论而言，“成人”的这一终端立鹤，两个思想源头没有不同，而且就是王阳明“事上磨练”归“致良知”，是在解决问题时要达到“破心中贼”的德性提。PBL中的“价值性问题”，是为了把人们的认识活动升华到心性修养之中。就此而论，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二者契合，乃是一种“视域融合”：高职思政课在把“乡村振兴”问题，与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治理知识结合起来时，即是把王阳明“知行合一”在今天的有效意义“创造”了出来。PBL将“问题即工夫”的本体论还原，把《传习录》里的“知行本体”带进了高职思政课堂。让书斋里的知识辨析走出知识内部，在“事上”展开；因此也使得“学以至圣”的“思致”之路有了落实。于是就会发现这种“似曾相识”的范式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直面当下现代教育困局所提供的哲学性回答。

4 实践路径：

“问题 - 情境 - 评价”的高职思政课三维建构将王阳明“事上磨练”的工夫论和PBL实践路径以“问题—情境—评价”三重面向作学理契合，来构造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实践教学谱系化建构。其不但不是孤立的教条式的理论噱头式整合，并没有拼盘的性质，而且是对“知行本体”的新阐释；它是根植于“心即理”（《传习录》）本体论的原创性综合。王阳明释“格物”为“正事”（《大学问》）、将其“定性”为“心之所发”的存在论空位，“PBL驱动性问题”（Driving Question）也正是这种“意之所在”的现代转译：问题不是外在于学习者的事物知识客体，而是导致“愤悱”（《论语》）发生的意义空白。《传习录》载“知痛必已自

痛了方知痛”，阐明所谓问题的本体论性质：即学生的知处于潜在状态，他们只有在自身的经验世界里遭遇认知矛盾时，才会在“事上”具体化，在此过程中“知”便从潜设的模式转向实践性的选择，在这种“问题即契机”思想的影响下，建构主义“认知冲突理论”与这一思想巧妙相合，即一个问题并不存在于其答案本身，而是促使人们“致良知”。王阳明“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体知观，为PBL的情境设计提供哲学依据。情境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知行本体”的显现场域——“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的著名论断，揭示情境的意义生成性。PBL的“真实性情境”（Authentic Context）通过具身化设计，激活学习者的“身体记忆”，使“闻见之知”转化为“德性之知”。王阳明说：“民本”他的“民本”之说，在PBL中就是一种内化了的的价值评价，并且转化为了形而上的“民本”。与量化考核不同，PBL考察的是“民本”的过程性，高职思政课就是考察学生在活动设计方案中是否能够落实好“民本”，实施过程中能否在突发状况下及时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哲学诠释学来说，PBL就是“民本”的过程，高职生借助“民本”的途径，将“民本”不断地叠加进“民本”，最终生成“民本”，这就是当代的王阳明“民本”即“民本”进行建构与重组的实践诠释。另外，这种基于“民本”的评价方式还摒弃了西方PB中国有的工具理性偏重于价值理性的建构取向，站在我国儒家“民本”价值传统的立场上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5 当代价值：

在“知行合一”中培育时代新人处在“知识焦虑”和“实践乏力”的数字时代，“知行合一”正是打开“空心化”教育困局的一把金钥匙。2023年1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发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调研成果，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3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00后在网络上获取碎片化信息、化解情绪，但是也常常会出现所谓“知而不行”的困境，所以我们要还原其“事上磨练”的实践传统，要让“知行合一”来促进这个具有德性智慧又有实干能力的时代新人的塑造。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是“致良知”，强调知识的德性维度。在算法推送制造“信息茧房”的今天，00后高

职院校学生最稀缺的不是知识增量，而是价值判断力。《大学》“格物致知”的终极指向是“诚意正心”，这种“德性之知”的培育，需通过PBL的“价值性问题”激活学习者的“良知”。当学生在问题解决中遭遇“义利之辨”，王阳明“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准则”的教诲，成为抵御相对主义的定海神针。这种德性培育不是道德灌输，而是通过“事上磨练”实现“知行本体”的自觉——正如“乡村振兴”问题中，学生在传统保护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中，体认“民胞物与”的伦理智慧，完成从“知识消费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蜕变。此外，PBL的开放性使学习者在“问题界定-方案设计-原型测试”中，践行“行是知之成”的创造逻辑。

所谓时代新人的重任便是知行合一地通过事上磨练人的主体生命世界、人的关系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实然意义，最终使时代新人懂得了要知而更行、知而能行，并把所行之物合乎那个“知”的方向与预期来达成价值确定性的积极行为方向以及具体实现方法的操作。由此可见从“知行本体”到“时代新人”的发展理路：知行目的为“唤醒”每个个体“事上磨练”敢于践行和善于践行的勇气与智慧。当高职院校的学生把“知行合一”真正应用到“碳达峰”问题中去的时候，也是他们用“即知即行”传统接续着千年的华夏文明中美好实践，这也是我们新时代语境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对“什么人才是新时代好青年”“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时代回答。综上所述，从《论语》“学行统一”到《传习录》“知行合一”，儒家实践哲学在高职思政课实现了当代转译。本文提出的“问题-情境-评价”三维建构，本质是王阳明“事上磨练”的本体论在职业教育场域的具象化。以儒家知行观重构高职思政课的“实践理性”，使其获得哲学根基，在“德技并修”方面获得本体支撑。

参考文献

- [1] 孔子. 论语 [M]. 朱熹, 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郭店楚简. 性自命出 [M]. 荆门市博物馆, 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3] 朱熹. 朱子语类 [M]. 黎靖德,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王阳明. 传习录 [M]. 陈荣捷, 译注.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5] 王阳明. 大学问 [M]. 王阳明全集 (上册). 吴光,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6] 王阳明. 与杨仕德书 [M]. 王阳明全集 (中册). 吴光,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